

# 马克思恩格斯 列 宁斯大林 研究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2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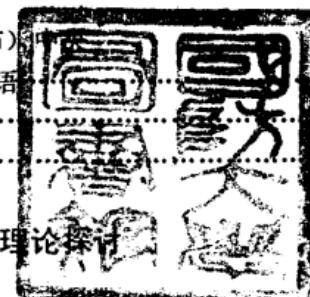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 目 录

### 新 文 献

斯大林在 1937 年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 (1)
斯大林与多列士的谈话	..... (25)
斯大林给比雪华里的信	..... (56)



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 泰·奥伊泽尔曼 (59)
列宁关于苏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演进	
.....	俞良早 (85)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去和现在	..... 弗·哈尔拉缅科 (102)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非洲	..... 托·梅森赫尔德 (118)

### 《共产党宣言》150 周年

从《共产党宣言》来看当代资本主义

- 2F100/20
- 剥削和阶级斗争问题 ..... 伊瓦什凯维奇 (12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介绍 ..... 蕾·默克尔 (160)

### 史料研究

-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帕·费·尤金的谈话 ..... (194)  
斯米尔诺夫谈未发表的列宁文献 ..... (203)  
论“社会革命主义”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的  
复兴及其自我修正 ..... 金 厥 (206)  
俄国共产党的今与昔 ..... 孙凌齐 (228)

### 译校札记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  
第32卷校订总结 ..... 卢晓萍 (2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  
第32卷校订实例 ..... 冯文光 (247)

### 人物与事件

- 斯大林年谱(四) ..... 项国兰 (274)

### 书评与书讯

- 德共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伪装本 ..... 梁 明 (288)

# 斯大林在 1937 年联共（布） 中央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年3月5日）

**编者按：**此件部分内容已收入《斯大林文集》第 160—175 页；这次发表是按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5 年第 11—12 期合刊刊载的有关文献译出的。原先发表的文献不仅篇幅少了近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涉及当时联共（布）高层领导人的内容被完全删掉。将前后发表的文献加以比较和研究，或许会对读者有一定的帮助。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现在请允许我在结束语中简要地谈一谈更为具体的几个问题。

看来，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事务，陶醉的原因是这些事务能带来直接结果，而且可以说，这也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件事，这样过分陶醉而忘记其他问题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同志们对此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了。

从一些发言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从这个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是公理性的论点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有人认为：“好了，

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笑声。）“……现在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

同志们，这是另一个极端。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和不应该离开政治一样。我们仅仅是为了便于研究，才在方法上人为地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千万不能。决议草案的意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自行代理经济机关的职能，不能取代，不能把经济工作的指挥部——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一样——搬到第一书记的办公室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我们只是定下了方针。要实现关于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和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方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应当充实农业机关，给这些机关配备优秀人才。工业（基础比较坚实）以及工业机关看来是用不着你们取代它们的。这很好。情况差一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机关。应当尽全力派人加强这些机关，而主要是应当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的方法，不要取代这些机关并使它们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而要帮助这些机关，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问题正在于此。

只要农业机关还没有得到充实，得到巩固，你们，很遗憾，在最近时期内就不得不直接从事农业事务，以防这些事务根本无人过问。所以说，必须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领导整个经济即工业和农业的方法。应当巩固经济机关，以优秀人才充实这些机关，从旁帮助这些机关，给这些机关提供领导思想并通过这些机关领导经济，不应跑到另

一个极端，也不要拒绝做经济工作。这样就不会产生，同志们，就不会产生另一个极端。

下面谈一谈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一切托洛茨基主义和非托洛茨基主义代理人、外国代理人的问题。我想，所有的同志们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不管这些人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这些人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是一伙无廉耻的匪帮，其中有雇佣杀手，破坏分子，间谍，暗害分子，等等，等等。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但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同志的讲话中流露出一种想法：让我们左右开弓，打击那些曾经与某个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同行的人或者曾经在一个公共食堂同托洛茨基分子同桌吃饭的人。现在让我们左右开弓地打击这些人。

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对的。在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有我们一些出色的人才，这大家都知道，有优秀的工作人员，他们过去偶然动摇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后来同托洛茨基分子断绝了关系，并且像令人羡慕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工作。捷尔任斯基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有人喊道：谁？）捷尔任斯基同志，你们是知道他的。因此，在捣毁托洛茨基分子的巢穴时，你们应当认真观察，亲爱的同志们，打击对象要有所选择，我再说一遍，不要殃及那些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偶然同行的个别的同志。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布尔什维克对这件事的理解如下。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看他们是否忠于党，政治上是否可靠；第二，要看业务能力，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公理性的准则，对此用不着多说。在我们这

里这个准则遭到了破坏。这个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已经谈到了。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我要举的这两个例子说明，有的时候挑选人不是根据政治和业务的原则，而是从私人交情、哥们义气、朋友关系的角度出发，总之是根据种种庸俗的标准，根据在我们的实践中不应有的标准。就拿米尔佐扬同志来说。他现在哈萨克斯坦工作，原先他长期在阿塞拜疆工作，离开阿塞拜疆之后曾在乌拉尔工作。我曾几次警告他：既不要从阿塞拜疆，也不要从乌拉尔带出熟人，而要在哈萨克斯坦挑选人，不要同哈萨克斯坦当地人相隔绝，原因是——从阿塞拜疆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从乌拉尔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同样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有了某种对当地组织的独立性，甚至是某种对中央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的小团体，我有自己的小团体，它们全都忠于个人。请看，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达巴什扬同志当上了南哈萨克州委组织部计划部部长，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克扬同志当上了库斯塔奈州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尔基相同志当上了贾塔戈里区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波乌兹比克扬同志当上了赛桑区委书记，他从格鲁吉亚带去的艾拉佩将当上了列宁区委书记。我讲的是中央机关提供的情况。

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什拉江同志当上了卡尔萨克帕伊区委书记，他从巴库带去的阿斯里扬当上了边疆区委组织计划部部长，当上了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苏维埃主席的萨乌莫夫同志，也是他从巴库带去的。萨尔基索娃当上了阿拉木图市斯大林区委书记，尤素波夫当上了阿拉木图市委书记，这两人都是他从巴库带去的。他从原先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带去的平哈西克当上了卡拉干达州委书记。有一个姓斯维尔德洛夫的人现

在当上了东哈萨克州委书记，他也是从巴库带去的。先是把他从巴库调到乌拉尔，然后从乌拉尔调到这里，调到哈萨克斯坦。当上阿拉木图州委书记的基谢廖夫是从乌拉尔带去的。来自亚速海-黑海地区的斯捷潘诺夫当上了北哈萨克州委书记。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库利耶夫当上了奇姆肯特州委书记。卡马基泽当上了哈萨克边疆区委员会农业局副局长。（贝利亚：相当可疑的一个人。）人们怀疑他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总之，所有这些人在他们原先的共和国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嫌疑。（有人喊道：库利耶夫被解除了政治部的工作。）公用事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尔扎耶夫原任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有人喊道：他由于工作不称职而被解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他也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利耶夫·铁木尔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巴拉诺夫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拉诺夫先是被他调到乌拉尔，又从乌拉尔被他带到了哈萨克斯坦。（米尔佐扬：他从未同我一起工作过。）巴拉诺夫我们还是了解的。

这象什么话？难道可以这样挑选人！请问，这会导致什么后果，能有什么好结果。我可是警告过米尔佐扬同志，叫他不要这么做，应当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干部。可他，大家知道，却组成了忠于他个人的小团体，他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挑选人，而在这些人中有托洛茨基分子。但他认为，既然他们忠于他，他们就能永远与他合作。那以后他要是不在了呢？

另一个同志是瓦伊诺夫，他同米尔佐扬一样，也从其他州带去人，特别是从〔……〕带去了 23 个人。这样的人在那里多得多，因为在苏维埃机关里还有许多人。从顿巴斯带去了 9 个人：茹拉夫廖夫、魏斯贝格、克里梅尔、伊万诺夫、卡茨、波努卡洛夫、尤尔洛夫、亚历山德罗夫和伊萨耶夫。他从顿巴斯

调到雅罗斯拉夫尔当书记后，便逐渐从顿巴斯把这 9 个人弄到自己身边——离开这些人他就无法工作。这些人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位。瓦伊诺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地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外来的人呢？当然是怀有戒心。带去人，用外来的、忠于个人的人组成小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信任当地干部。米尔佐扬或瓦伊诺夫有什么理由对当地干部不信任——请他们说清楚。这些同志包揽的事情太多，从而使自己、使党都陷入了窘境。

这样挑选人是不行的。谢尔戈同志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是经济工作高级领导人，可我认为，他也染上了这样的毛病：欣赏某一个人，公开说某些人忠实于他个人并对这些人恋恋不舍，而听不进党和党中央的警告。他为了拉拢洛米纳泽而大伤脑筋。他大伤脑筋的是，他始终认为他能够使洛米纳泽改邪归正，可洛米纳泽却总是欺骗他。他为了维护所有那些现在来看显然是坏蛋的人如瓦尔达尼扬、戈戈别里泽、梅利克谢托夫、奥库贾瓦（现在在乌拉尔被揭露）而大伤脑筋。他自己大伤脑筋，也让我们大伤脑筋，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最信任和他认为忠实于他个人的那些人，原来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坏蛋。这样一个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的经验表明，以个人的好恶来挑选人是极其有害的，尤其是像米尔佐扬和瓦伊诺夫这样的人，我不能认为他们是高级领导人，但我举他们的例子是为了指出，这些人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党。这种挑选方法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党的挑选人的方法，趁现在为时还不算晚，同志们应当摒弃这种方法。

第四个问题。检查工作，检查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应当怎样审查工作人员，一般来讲是否需要审查呢？毫无疑问

是需要的。如果不根据人们的工作结果来对他们进行审查，就无法了解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无法确定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不能根据言论、宣言和口头上的声明来对一个工作人员的本质作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这是危险的，这是幼稚的。为了了解工作人员，应当在工作中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对他们进行审查，应当日复一日地进行审查。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审查办法呢？有自上而下地审查，即上级领导人对其属下的下级领导人进行审查，到他们中间去，或请他们来，总之根据工作结果进行审查。这样做非常正确，非常好，但这是不够的。在我们中间甚至这一准则也常常遭到破坏。选定一个人并把他放到工作岗位上就完事大吉，以后就把他忘记了，不过问，不检查，也不给任何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给予帮助，他们发牢骚，叫苦连天，一封又一封地写信，一份又一份地发电报，但既得不到答复，也得不到安慰，总之把你往工作岗位上一放，就算把工作包给你了。这是破坏列宁关于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最起码准则的行为。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审查，来自上级的审查，即上级对其下属进行审查；还有自下而上的审查，即党员群众或非党群众对领导者进行审查。党员积极分子或非党积极分子。或者是人民通过选举亲自进行审查。例如我们组织的我国最高机关的选举，这次选举是对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的一次大审查。自下而上审查的手段——这就是经常性的积极分子会议，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以及领导者的工作报告，即关于自己工作的诚实的、实际的工作报告。许多同志逃避这项工作，他们陶醉于经济运动，认为自己[……]世界。然而他们错了，显然他们迷失了方向。

应当在各人民委员部恢复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

子会议，在各企业恢复原先叫作生产会议的东西。召集整个工厂的人开会是困难的，我们有些工厂有3—4万人，但可以从优秀的党员和非党员中挑选出积极分子并向他们报告工作和了解他们这些积极分子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发现了哪些错误。

党员积极分子会议，非党和党外积极分子会议，领导者在这些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工作——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段。还有另一个手段——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恢复民主集中制。这也是一种审查，同志们。在党章的基础上恢复党的机关的选举制。不记名投票，对任何一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批评的权利。你们看，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的第二个手段。两种手段都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因此，我们有两种审查工作人员的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上级审查下级，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即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自下而上的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的监督是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并由领导者报告工作，另一种形式的监督是恢复我们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即党员有对任何一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有自由批评的权利，有要求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权利。

第五个问题。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曾经教导我们说，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教育干部，培养和训练党及其他组织后备力量的最好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及时帮助干部揭露他们的错误；及时帮助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领导者揭露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错误并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彻底改正错误，而不要像有些人那样，担心这样做会被敌人所利用。

有为数不少的人或工作人员不高兴这样做，然而应当教育

这些人，使他们有勇气倾听批评意见，养成习惯，从而使工作人员有可能步步向上、不断进取。

举几个例子。你们都记得 1930 年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上的错误，当时称之为胜利冲昏头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无情地批评我们的干部的坚定方针。而当时，你们知道，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在各州之间展开了一场大竞赛，看谁集体化的百分比高。一队宣传员来到村里，把 500—600 户村民召集到一起开大会，并询问谁拥护集体化。同时作了非常明显的暗示：你要是反对集体化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农夫们说：我们没什么说的，你们组织吧，我们拥护集体化。这以后电报一份接一份飞向党中央委员会，说我们的集体化在发展，而经济却依旧在旧轨道上运行。根本没有集体组织，只不过是表决拥护集体化。

我们检查过莫斯科州的情况，表面上 1930 年集体化似乎达到了 85%。这一百分比的实际可信程度有多大呢？实际上，集体化最多达到了 8%，而不是 85%。是的，你们在摇头，而实际上所有人都是这样。这是一种通病，每个州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

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抨击。我们的干部最终扭转了这件事，而且我们通过这件事也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如果我们不揭露这些错误，如果中央委员会担心我们会失去某些干部，担心我们会招致不满，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敢说出某些人不爱听的意见，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顶着这股潮流而上，我们就会把整个事业断送掉，并使我们的全体干部灰心丧气。我们就会断送农业干部的成长，断送集体农庄的发展。现在我们拥有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不错的领导者，我们通过彻底揭露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并走上了新的道路。

另外一个例子是沙赫特案件，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地抓这件

事，没有按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干部通过自身错误得到教育的机会，那可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大失误，就会毁掉工业事业。许多同志担心反潮流会对敌人有利。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结果我们胜利了。揭露了自己的错误并通过这件事教育了自己的经济工作干部。从那时起——沙赫特事件以后——已经过去了 10 年，我们培养出一批从事技术领导工作的优秀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我们听信（哪怕是一时片刻）所谓反潮流会得罪人、会对敌人有利的论调，就不会有这些干部，他们就会灰心丧气，变成一盘散沙。

这就是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就是要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分析自己的错误并找到改正错误的途径。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部才能成长才能得到锻炼，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且列宁的这些话也多次得到证实，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第六个问题——什么叫爱惜干部？到底怎样才能保护和培养干部呢？爱惜干部。有许多同志认为，如果对一些同志的错误轻描淡写，如果掩饰并只是部分地指出同志们的错误，那我们就是爱惜干部和保护干部。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呢？谁要是认为掩饰我们干部的错误就是保护干部，爱护干部，谁就是在害干部，毫无疑问，他就是在害干部。对我们干部的错误轻描淡写，对错误加以掩饰——这不是爱惜干部，而是害干部。害干部。

我想从我们某些非常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中举几个事实。例如谢尔戈同志，我对他的尊重不是亚于而是胜于某些同志，但对他的错误我应当在这里指出来，以便我们大家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就拿他与洛米纳泽的关系来说。洛米纳泽在党务和政务工作方面出现过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早自1926—1927—1928年起，谢尔戈同志对这些错误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错误，他寄希望于自己，希望他自己能扫除这些错误，从而在这件事上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他与他即谢尔戈同志与洛米纳泽书信往来频繁。我们只是在后来，在这些信件写成八九年之后，我们后来在中央委员会才知道这些信件具有反党性质。谢尔戈同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纯粹是出于他的善良愿望，显然他是希望对此加以改正。

由于我们不了解洛米纳泽的本质，我们中央委员会不了解，所以我们曾把他派到同僚处去，看看他做得如何。了解一个人非常困难。通过方法，给予他冒险安排，给予他责任重大的工作并关注这样做的结果。我们采取了这种冒险的方法，安排他担任外高加索共产组织的书记。如果我们知道他与谢尔戈的往来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就不会把他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然而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是拥护党而是反对党的。

恰恰在这一时期谢尔戈同志收到了洛米纳泽的一封很不像样、令人厌恶和违反党性的信件。他跑到我那里说：“我想给你看看洛米纳泽的信”。——“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写得不像话。”——“把信给我，我向政治局汇报，中央应当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不行。”——“为什么？”——“我答应过他。”——“你怎么能答应他，你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党的传统的保卫者，你怎么能答应别人不把有关中央和反对中央的反党信件告诉中央委员会呢？怎么，你同他同洛米纳泽有什么反对中央的秘密吗？这像什么话，谢尔戈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确实不行。”他一再请求，请求我看一看这封信。看

来，他是想让我在道义上对他与洛米纳泽的那些秘密同他共担责任，当然，他对洛米纳泽那些无疑是反对中央的观点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纯粹是对事业的贵族态度，甚至是骑士态度。我对他说，我不想参与这样的秘密，我迄今为止一直自认为是中央委员。你把信给我，我马上把信分送给政治局委员，让他们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我向中央作汇报；而谢尔戈却说：“你会毁了他，毁了洛米纳泽。”——“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信是反党性质的，但还不是那种可以据此将他开除出党的信件，——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把信的事情告诉中央委员们，那么在大事上洛米纳泽就会变得收敛一些。如果你在这件事上瞒着中央并对他百般袒护，洛米纳泽今后就会认为以后还可以犯反对中央的某种错误，因为反正有人保护他，这样洛米纳泽就会重犯这类错误，今后他就会在大事上栽跟头，而如果他在大事上栽了跟头，我们就会让他粉身碎骨，彻底灭亡。你害了他，你认为你是爱惜他洛米纳泽。按照庸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按照实际的观点，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你是害了他，因为你没有及时制止他。”他说，这样的信件过去也收到过。那么就更糟了，无疑是你把他毁了，是你把他置于中央的打击之下，因为他现在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已经无法饶恕他了。

结果就是这样。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当然，对这一悲剧谁都不像谢尔戈这样痛心疾首，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而这个人却对他的信任报之以欺骗。他要求枪毙洛米纳泽。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从袒护他变成了要求枪毙他。我们说：“不，我们不会枪毙他，我们不会逮捕他，我们甚至不会把他开除出党。我们只是要把他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举的一个例子，谢尔戈同志一个人的例子，经他的手任命的人

数以万计，他培养了数千名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看，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掩饰、袒护一个同志的错误，不及时地制止他，相反却加以袒护，——你就害了他，肯定会害了他。

那么，什么叫爱惜干部、保护干部呢？这就是说，如果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及时给他们指出，及时加以制止，而不是袒护和掩饰。这是爱惜干部的唯一的方法，保护干部的唯一的方法。

应当怎样用列宁主义的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呢？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我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现在还可以更具体地说上几句。

首先，同志们，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鼓足干劲，首先为自己培养两个副手。现在在职的第二书记或其他什么人，他们能否称职，可以说，这取决于你们的洞察力，取决于你们了解人的本领。但副手应当成为真正的副手，名符其实的副手，有能力代替你们的副手，因为如果中央通过了决议草案的这一条，看来，中央会通过这一条的，那么我们显然将要着手做这件事。

我们党有 102 000 个支部，即 102 000 个基层党组织。那么就有 102 000 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将每隔 4 个月，每隔 5 个月送他们所有人去培训班，或每隔 3 个月，每隔 4 个月送去——这将视实际情况而定。但在送他们去之前，他们这些书记们应当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而为避免他们选错人，副手名单应当由有关的区委会予以批准。我们应当送 102 000 个书记去接受党政培训和再培训。这是我们党的士官，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十分之九的工作都取决于他们。

我们有 3 500 多个城市和非城市的区委书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挑选两名名符其实、有能力代替他们的副

手，——入选的是否是现职的第二书记，我不知道，但对我们对书记们挑选唯命是从的人做自己副手的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这样做是不行的。中央将要求副手们成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和有能力代替区委书记的副手。我们有大约 3 500 个书记。我们将派他们所有人去学习，去接受再培训，去上培训班即我们说的列宁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教学大纲将由我们制定，我们将同你们这些各州和各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做这件事。将指定若干个中心来组织这些培训班。当然，决议草案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硬性规定，中心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只要教学工作能够真正安排好就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遗憾，是为了统计，为了汇报，为了编制名册，而应当是为了真正列宁式的政治学习。

我们有数百个市级委员会，这次全会以后，州委或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看来要担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为此应当赋予他们直接的责任。市委将设第二书记，数量可能是两个。我们希望市委第一书记为自己挑选两名名符其实的副手，也派他们去参加党史培训班的学习。

我们有 100 多个边疆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有书记，各民族州也是一样。我们也将要求每一个第一书记尽力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两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副手。我们将在中央批准对他们、对这些副手的任命，以便后来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能来到莫斯科并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有一定的意义。

我在报告中讲过，这里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些老头子，政治局的委员们，很快就将退出舞台。这是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有若干个接班人，而为了组织好这件事，现在就应当着手去做，亲爱的同志们，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中